

吴梦麟
熊鹰
著

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

赵其昌
撰



文物出版社



北京社科规划“九·五”课题

北京地区基督教 史迹研究

吴梦麟 熊 鹰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梁秋卉
责任编辑：李缙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 / 吴梦麟，熊鹰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0. 09

ISBN 978 - 7 - 5010 - 3017 - 0

I. ①北… II. ①吴…②熊…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498 号

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

吴梦麟 熊 鹰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文博利奥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14.25

2010 年 09 月第 1 版 2010 年 0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017 - 0 定价：98.00 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基督教的产生与传布	(3)
一 唐代景教的传入与发展	(3)
二 元代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5)
三 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10)
四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	(16)
第二章 北京景教史迹文物研究	(18)
一 景教传入北京的历史沿革	(18)
二 北京地区景教史迹文物概述	(19)
(一) 元代景教史迹文物	(19)
(二) 明代景教史迹文物	(55)
(三) 几点认识	(55)
第三章 北京天主教史迹文物研究	(57)
一 天主教传入北京的历史沿革	(57)
(一) 元代天主教传入历史	(57)
(二)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历史	(58)
二 北京天主教史迹文物概述	(59)
(一) 元代天主教史迹文物	(59)
(二) 明代天主教史迹文物	(61)
(三) 清代基督教史迹文物	(81)
(四) 近代基督教史迹文物	(178)
第四章 北京东正教史迹文物研究	(187)

一 东正教传入北京的历史沿革	(187)
二 北京东正教史迹文物	(188)
(一) 遗址、遗物	(188)
(二) 其他文物	(190)
第五章 研究成果	(191)
一 元大都基督教史迹文物的价值与特点	(192)
二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丰富的基督教史迹文物形成的原因	(192)
三 北京地区明清时期基督教史迹文物的特点	(193)
参考文献	(195)
英文提要	(198)
后 记	(200)

序 言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世界闻名的古都与历史文化名城。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掀开了北京七十万年历史的帷幕。之后，北京从周初封为“燕”、“蓟”诸侯治所，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后便逐渐从北方重镇上升为陪都与帝都。这种绵延不断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深厚的特点，在世界都城中也实属罕见。北京如此重要，不但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发生，还有许多名人也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与活动史迹。因此，今日在北京地区的地下和地上保存了许多年代久远、种类丰富的文物，这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条件和特点。今日地面上除留存有巍峨的宫殿、肃穆的坛庙、陵寝之外，还有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的府第、巨刹、会馆、民居，反映市井文化的店铺、名人故居以及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教堂等，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长卷。其中一直不太被关注的基督教史迹和文物，更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结构形式，成为长卷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此类文物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当初列为课题时即基于此目的，也拟整理出一份较为全面的材料，为首都决策部门提供信息，使这些历经数百年沧桑的文物遗存在研究“西学东渐”、“东学西渐”过程中的作用能得到科学的论证与评价。在课题被北京社科规划办列入“九五”课题项目并通过终审后，听到社会上对出版此书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给予的关注和支持，使我们更感到其意义重大。北京地区早在元朝就有景教、天主教传入的历史，明清时期又有了大的发展，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文物应该得到保护和研究，所以在完成课题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期待通过修改补充之后力争能够成书问世。

在编撰中，我们采取“扬长避短”的思路，不以介绍宗教历史为重点，而要发挥我们文物工作者掌握和经历文物变迁后获得的资料的优势，以旁征博引，公允评述，仔细考证的学风，争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此外，我们因从事的工作关系也与这一课题内容有一定的缘分。早在1978年，吴梦麟就参加过调查保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栅栏教堂及传教士墓碑的工作，1979年起主持了利、汤、南三氏墓地的抢救修复工程，竣工后不断有国内外要人及群众瞻仰、参观，政治上产生了良好效果，并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梦麟在此后也就萌发了搜集、整理研究北京基督教遗存文物的想法。熊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从事业务工作，曾参与正福寺墓地碑石的抢救与保护，并开始研究这些文物，撰写有关论文。当时著名古天文学家伊世同先生来馆考察这些墓碑，也敦促我们可扩大整理北京地区的基督教文物资料，尽早出书。1996年后，以吴梦麟为课题负责人，熊鹰参加，共同申请并被批准为北京社科规划“九五”课题。但终审后因工作任务缠身，又需要筹集出

版经费，故拖延数年，至 2009 年得到北京市文物局出版经费的资助，才使出版付梓有了保证。

本书收录的时代从元朝景教、天主教传入北京的历史开始，历经明清及民国时期。在地域上除了收录城区外，还扩展到郊区县，甚至深山区，涉及项目达数百处。类别上主要收录不可移动文物中的遗址、墓葬、石刻（含石雕）、建筑（古代及近代），也有部分馆藏文物，力图较全面地反映基督教（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脉络和史迹遗存与现状。

本书立意以文物实证为整理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尽量与文献互证，增强时代背景的阐述，使考证具有科学性，同时注意搜集一些相关的新发现，虽然有些不是直接属北京地区的文物遗存，但为的是提供一些相关的可资借鉴的信息。力争本书是一部内容准确，查阅便捷，有裨于学林之作，也了却多年夙愿。

第一章 基督教的产生与传布

基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下层派别，2世纪时脱离犹太教，在地中海沿岸得到迅速传播，发展成为新的宗派，至3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整个罗马帝国，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4世纪初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基督教在发展中因政治区划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而演化为东、西两大派系。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中国称之为天主教，传播于法国、意大利和北非迦太基一带及其以西地区，通行拉丁语，故又称拉丁教会。东部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教会为首与西部罗马对峙，自称“正教”（即正统教会，亦称东正教），据有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及其以东地区，通行希腊语，故又称希腊教会。基督教在欧洲占统治地位，是欧洲各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到16世纪时罗马公教内部掀起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三大新教主流派，并陆续又分化出脱离罗马的其他宗派。中国对新教通称基督教或耶稣教。此后，基督教各派逐渐传遍世界各大洲，而传入中国也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自唐代以降曾经4次传入中国，前3次传播受挫，但到了近代，因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败，甚至解体的阶段，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才在中国城乡各地得以深入和传播，产生许多特殊现象，形成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给中国的历史打上了一种特殊的烙印。

一 唐代景教的传入与发展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支，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380~451年）原是安提阿（今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近郊隐修院的修士，于公元428年时出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该教派以其名命名，他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融合为一个“本体”，认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具有真正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的统一，是精神上的统一，不是物体上的统一。因此，马利亚只是基督的人身之母，并非“上帝之母”，他的这一学说被指责为双重位格论，即基督二性分立论，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位于小亚细亚的爱琴海边）的全体教会会议上被判为“异端”。以后，他的信徒和追随者被迫逃往波斯，与那里早已存在的古代东方教会结合，于公元484年建立了独立的东方教会，并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优待，还造就了一批颇有声誉的医生和教授，并能长期为波斯宫廷服务。公元540年，该教会作了彻底改革，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他们的传教士从美索不达米亚一

直到了印度和中国新疆，并在7世纪中叶进入了中国内地。有关该教在唐代时已传入中国一事，17世纪以前，无人知晓，后因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西南周至或西安西部（两种说法）出土了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证实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教士确实在唐贞观九年（635年）来到了中国。此碑高2.36、宽0.86、厚0.25米，螭首，其上刻有飞云及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左右配有荷花。碑上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首中部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9字，碑文中除简略叙述基督教基本教义外，又记述了景教自主教阿罗本来华后，在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几代皇帝的优待下的发展经过以及对上述6位皇帝的赞颂。碑文作者为景净，是一位景教教士，教名为亚当，曾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等，其祖父是由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来到中国的景教教士，其父伊斯是景教中的“白衣”教士，曾效力于肃宗、代宗和德宗三代朝廷。景净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景教碑的出土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并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景教碑出土后的300年中，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了7种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这些文献和景教碑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基督教曾经传入中国，在唐朝活跃过250年之久。唐代以前是否已传入，只在西方流行一些传说，但因无历史依据，不足为信。在中国的文献中，如《洛阳伽蓝记》、隋翟突莎墓志等也传递出一些唐代以前景教传入中国的信息或线索，但仍不能断定那时中国已有景教的传布。只有通过《佛祖通记》、《僧史略》、《佛门正统》等儒教文献和史籍的佐证，才可能是较准确的史实。据载，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来到唐朝京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曾派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还让阿罗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通过翻译的《圣经》，在亲自询问福音的道理后，因“深知正真，特令传授”，曾下诏“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之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四九）。此诏令与景教碑文记载基本相同，仅碑文中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而《唐会要》中则称“波斯僧”。唐朝时除佛教外，还有3个外来宗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因他们均来自波斯一带，又几乎同时传入中国，所以唐代时人们分辨不清，就统称其为波斯胡教，甚至将景教误认为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唐高宗时，景教有了极大的发展，他继承太宗时对景教的优待政策，“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在各州建造景教寺，当时除了长安、洛阳外，在周至、灵武、成都、扬州等地都有建寺的线索可寻。从武后临朝称制到唐睿宗逊位（683~712年）之间，景教受到佛教的排挤与攻击，在宫廷政治中失去支持，一度衰落。

唐玄宗即位后，恢复了唐太宗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政策，景教曾不断派教士来华朝贡，千方百计讨好唐皇，教士们还在王公显贵之间周旋，运用行医等手段传教，《册府元龟》卷五四六中记载：开元二年（714年）“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又在《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中记到：“开元二十年（732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即果毅郎将，武官职衔，官阶从四品），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匹，放还藩。”开元廿八年（740年）玄宗因兄患疾，由精通医术的景教教士崇一为他治病。玄宗还令其兄弟宁国王等王亲至景教寺“建立坛

场”。天宝初年又派内侍高力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的画像安置在寺内。翌年唐玄宗正式下诏将景教寺由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并御书“天题寺”榜额。此时景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达到了高潮。但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时，突发“安史之乱”，玄宗仓皇逃蜀避难，肃宗在灵武即位，但他在流亡期间对景教仍予保护与支持。之后，即位的代宗，对景教也极为尊崇。他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死，德宗登基，他对景教仍“惟新景命，”对景教仍怀好感。但后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景教处于衰落期。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八月时，下诏灭佛，景教也同时被禁。此举给景教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但仅过两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时就收回了“灭佛”令，佛教再度复兴，而景教却从此未能发展，甚至该教竟在中国内地绝迹。但在西北边远地区，如蒙古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汪古等部以及畏吾儿（古称“回纥”、“回鹘”等）、吉利吉斯等民族中继续存在，并盛行一时，也为元朝时景教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教，但以失败而告终。2006年河南洛阳新出土唐代《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经幢题记，不仅是千年前东方基督教入华后的文物证据，也是见证洛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最珍贵的遗物之一，是世界基督教文化重大发现之一，弥足珍贵。北京在唐代时为北方重镇，经济、文化较发达，然而目前还未发现有关唐代时基督教传播的史料及文物。

二 元代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基督教在元代时再次传入中国广大地区。大约在11世纪下半叶时，草原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允许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于是能在中国北方地区重新出现。到13世纪中叶，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元帝国，其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所以基督教也能在中原地区得以流传、发展。当时入华的基督教分为两支，一支即继续流行在中亚、蒙古诸地的唐代时称为景教，原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东方教会，另一支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派遣来华传教的方济各会（一译法兰西斯会，亦称小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修士。元朝蒙古人统称之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教名也。”（元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其教士和教徒，也称“也里可温”。因两派都崇敬十字架，故又称“十字教”，教堂称为“十字寺”。蒙古语“也里可温”含义至今还未确认。蒙古人进入中国内地以前，称基督教徒为“迭屑”，源自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自元世祖忽必烈时起，“迭屑”一词弃而不用，文献和碑铭中改用“也里可温”。其意为有福缘的人或信奉福音的人。今学者多采此说。元代史籍和碑铭中指也里可温为“长老”，是对教士、司铎的尊称。

在蒙古兴起的前后，分布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和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及居住在阴山以北的汪古（或雍古）部都信奉景教。公元981年在高昌一带有“波斯僧”，应是景教徒。11世纪初，中国西北的突厥人中盛行景教，西方有记载。13世纪蒙古国力强

盛，原信奉摩尼教的一大批人改宗景教。元定宗贵由登基时，亚美尼亚国王曾遣使赴和林朝贡，并写有专门报告，文内记道：“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可见，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中国西北草原已有基督教的流传。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以后，与克烈部等联姻，后妃、贵戚、将相大臣中，不乏信奉景教者。如术赤太子和睿宗拖雷二人的王妃都出自克烈部，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人的生母、睿宗庄圣皇后唆鲁禾帖民（别吉太后）是克烈部王罕的侄女，死后停柩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十字寺内。在《元史》卷三八《顺帝本纪》中载：“至元二年三月丙申，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乾隆时期的《甘州府志》卷二：别吉太后，世祖皇帝母也。初元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歿。世祖便于十字寺祀之。十字寺在甘州城内西南隅，名大寺。此外，太宗窝阔台的皇后、定宗贵由的生母脱烈哥那、贵戚中的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大臣中有太宗和定宗朝的中书右丞相、克烈部人镇海、宪宗朝重臣孛鲁欢、太宗朝元帅按竺迩、忽必烈世祖朝礼部尚书月合乃等都是景教徒。著名的两大文豪赵世延、马祖常其祖辈也都是景教徒。

元朝建立后，景教也随蒙古族进入中原，并在中原地区传播。元世祖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1235年在兴建哈刺和林城时，城内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为穆斯林商人和使臣居住区和市场，另一部分居住汉人工匠，城内除建有清真寺和佛寺外，还有景教寺（礼拜堂）。现已被国家公布为内蒙古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政府所在地的阿伦斯木古城为元代赵王城，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城内外有不少文物出土，其中有教堂基址（一些学者意见）和不少刻十字和叙利亚文的景教徒墓顶石。这些遗迹、文物都是研究景教在元代时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景教徒作为色目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待遇，与和尚、道士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许多圣旨碑中都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1253年抵达和林的卢布鲁克（图一），是方济各会会士，1253年被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赴蒙古，1255年返回，著有《东行记》。他曾游历了中国北部，记述了契丹（指中国北部）有15个城市



图一 卢布鲁克修士
（引自路远《景教与景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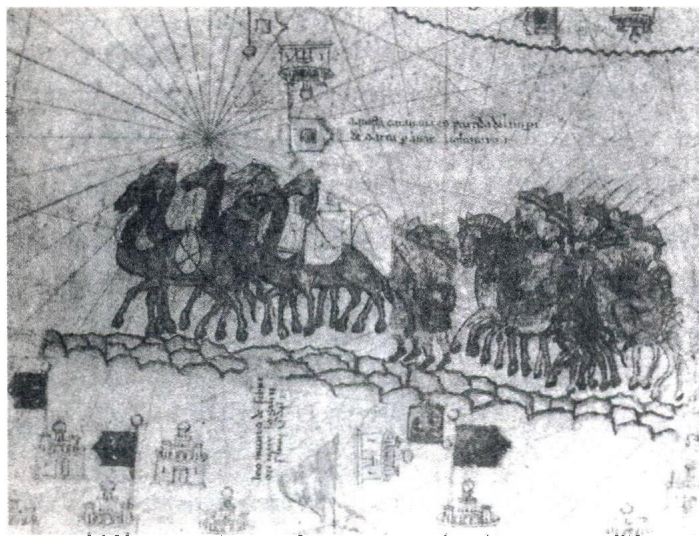
中有景教教徒居住，大主教驻地在西京大同。13世纪中叶时景教各教区主教驻地已登载25个主教区之多，西自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西夏）和汗八里（今北京），其中在中国境内有四处，即：第11区秦尼（指中国西北部），主教堂设在大同，汪古、克烈诸部在其辖区内，是景教盛行地区。第19区喀什噶尔（今喀什）。第23区汗八里，驻地元大都。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中国时，大都即是景教主教马聂斯托利的驻地。当时大都有著名的景教徒、畏吾尔人拉班·扫马和马克。他们二人是在西亚和欧洲负有盛名的中国景教徒。第24区唐古忒、统辖陕甘宁地区等西夏旧地，驻地在甘州（甘肃张掖）。以上主教区的设立，反映了元代景教几乎遍及全国的史实，其范围自汗八里往西，经山西、宁夏、陕西、甘肃，出新疆直通西亚，

或沿运河南下，过长江流域至东南沿海，可见其传布地域之广。元代崇福司是专门管理基督教事宜的机构，其官员称“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大元通制》）。意大利人，多明我会修士约翰·柯拉著的《大可汗国记》在1330年时估计景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实际情况可能会超过此数字。在对景教徒描述时，他说：“皆雄于资财，惟甚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在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这种评价较公允，不同于欧洲东游诸家天主教徒对景教的攻击。有关景教的文献、文物虽不太丰富，但新中国成立后有不断的发现，如东到赤峰、辽阳，南达扬州、泉州，中到北京，西抵西北，皆有新材料问世，无疑是研究景教的珍贵材料。



图二 柏朗·嘉宾修士
(引自路远《景教与景教碑》)

元朝时还有基督教的另一支，即罗马天主教的人华，其始于1294年。此前，因蒙古铁骑大举西征，引起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震惊，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曾先后派使节至蒙古帝国。在1245年时，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贝鲁齐亚人柏朗·嘉宾（图二）为使团首领，带着教皇劝告蒙古大汗停止杀掠欧洲基督教徒的书信，前来蒙古，历经3个月的长途跋涉，于同年7月22日到达和林，当时正值举行选举贵由为大汗的贵族会议。他逗留4个月后返回教廷。1247年教皇又派多明我会（一译多米尼会，亦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修士伦巴底·阿西林出使蒙古，拜见西征军统帅拔都，无功而返。1249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士、法国人安德烈·郎久木前来蒙古，郎氏等抵达额敏河（今新疆西北部）贵由的行宫时，正值贵由病亡，由皇后海迷失摄政。皇后接见他们后，复信要求西方称臣入贡。郎久木于1251年也返回。1253年春，路易九世又派方济各会修士、法国人卢布鲁克以传教的名义东来。先后觐见了西欧盛传是基督教徒的蒙古拔都之子撒里塔和驻在伏尔加河畔的拔都。拔都命他晋见大汗蒙哥，年底他抵达蒙哥在汪吉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附近的各营帐地，次年四月进入和林。在他的《东行记》中曾记载到，在蒙古大汗面前他与佛、道诸教论战并获胜，博得大汗和皇后对基督教的好感。皇后还常到教堂作礼拜，他为他们诵经祈祷之事。5个月后，他带着蒙哥严厉促降书返回，又以失败告终。到了1266年，威尼斯商人尼古拉和马菲奥兄弟来到上都（开平），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要求教皇能派熟知基督教教义、通晓七艺的百名学者来华，1269年尼古拉兄弟返回欧洲，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书信。两年后，尼古拉兄弟携带17岁的马可·波罗再次东来，他们三人经过3年半的旅程，于1275年夏抵达上都复命。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17年，颇得忽必烈的信任。1295年返回威尼斯后，因《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而著称于世。他作为中世纪的洲际旅行家，能不畏万里征程之坎坷，为探索东方世界的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等，历尽艰辛，在华历二十几个春秋，将其目睹之事，传给世人，成为西方早年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其历史价值可见一斑（图三、四）。



图三 《卡塔卢尼亚语地图》中所绘波罗兄弟之商队
(引自路远《景教与景教碑》)



图四 忽必烈将一道作为出使命令的敕令金牌
交给波罗兄弟(引自路远《景教与景教碑》)

他来自罗马教皇驻地，对其信仰的宗教在异地的传播自然十分敏感、关心。因而对当时中国各地的基督教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这些记载经与有关中外文献及考古资料相结合，发现其中大多数可找到佐证。如马文宽先生首先提及的城市是可失合尔，记其“可失合尔昔是一国，今日隶属大汗、居民信奉摩柯末……此地有不少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徒，有其本教教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1955年）。聂斯托利教会在13世纪中叶公布的25个教区，其中第19教区便是这座可失合尔城（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99页；裕尔编译，考狄尔补订《西域记程录丛》，又如行记中记“额里哈牙隶属唐古忒……居民是偶像教徒，然有聂斯托利派之基督教堂三所”，这里的额里哈牙即宁夏，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肃宗时“于灵武等王郡重建景寺”。1965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石嘴山市发掘西夏城址——省会城时，有铜透空牌饰出土（《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1期），此铜牌应是景教铜十字架徽章，又有年代可考，研究价值很高。除此之外，行记中还描述了内蒙汪

古部统治范围内，河北真定府、江南镇江府、杭州、昆明、汗八里（北京）、太原、平阳等地基督教活动情况，均不同程度地为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证实。其笔下所录的基督教正处在元代也里可温教在13世纪末以前发展的时期（见《〈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基督教初考》一文），行记中的记述是研究基督教史的珍贵材料之一。

另外在忽必烈朝时曾有拉班·扫马的西行，是很重要的活动。促使教皇尼古拉四世任命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萨莱诺人约翰·蒙特科维诺（图五）为教廷使节，前来中国传教，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开辟教区的第一人。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他首先在信奉景教的蒙古贵族中劝化，成功地使高唐王阔里吉斯改宗天主教。由于大都有信奉基督教的3万阿兰人，所以使天主教在大都能得到传布。具体情况可从蒙特科维诺分别写于1305年和1306年的两封信中得到了解。教皇克莱芒特五世得知蒙特科维诺传教顺利的消息，于1307年再派方济各会修士7人来华，协助蒙特科



图五 蒙特科维诺主教像
(引自路远《景教与景教碑》)

维诺主持教务，并代表教皇祝圣蒙特科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兼辖东方教务（图六）。1313年泉州也设立了主教区，城中建起了由亚美尼亚妇人出资建的豪华教堂，并成为主教座堂。由于元朝在经济上给他们优厚待遇，蒙特科维诺得以在中国独立传教30余年。在他任汗八里总主教的最后几年中，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也来到了中国，1322年抵广州，后到杭州，约在1325年达大都，谒见泰定帝。他见蒙特科维诺年事已高，急需派教士协助工作，在晋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后，准备率领50名教士东来，但因病于1331年去世，未能如愿。早在1328年蒙特科维诺也因病逝世，教皇为此曾派尼古拉一行来华，但后不知去向。1336年元顺帝曾派遣一个16人的使团，由泉州主教安德鲁等人带领前往罗马，请求派新主教，元朝使团于1338年抵达阿维农，受到教皇本尼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筹组

一个使团，以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等4人为专使，同元朝使团一起东行。他们于1342年8月19日到达汗八里，进城时，朝廷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他向元帝进呈了教皇的复书，并赠骏马一匹。使团在元大都居留4年，后循海路西归。元帝在他们临行时曾嘱托请教皇再派马黎诺里或红衣主教一级的人来担任主教，但他返回后不久，罗马教廷分裂，元朝也被逼北迁，基督教另一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就完全中止了。

元朝政府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特设崇福司，专管基督教徒，“掌管马儿哈昔（主教和长老）、列班（司铎和修士）、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事宜”。延祐二年（1315年）升格为“崇福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1320年）复为司”（《元史·百官志》）。当时崇福司和专管佛、道的宣政院、集贤院，合为元朝三大主管宗教的机构，崇福司主管长官司使四员，从二品，官秩在宣政院从一品之下，与集贤院同。元朝时的诏令中，排列在和尚、道士后的即为也里可温，其地位仅次于佛、道二教。景教一度在元朝统治者的庇护和支持下，在全国设立过也里可温掌教司（主教座堂）72所，天主教也在大都和泉州建立主教区，但教徒大多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综观元朝



图六 蒙特科维诺主教像
(引自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

时基督教活动的史实，他们在中国社会未能深入扎根，仅依附蒙元政府势力，所以随着蒙元帝国的兴盛和衰败而决定了其发展的轨迹。蒙元灭亡后也跟随着覆灭与绝迹。从已掌握的材料看确实如此，总的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不算大。

三 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自 1582 年利玛窦入华起，中西文化的交流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随之亦引起两种不同文化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此后在明末清初近两个世纪中，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既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亦将西方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中华文明介绍到欧洲，从而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高潮。

广义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但指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也包括中国与中国以西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狭义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指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这里就谈谈狭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就狭义的文化交流而言，17、18 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此之前虽然有过不少重大事件，诸如犹太人来华定居，景教东传，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传之久远的《游记》等。但是，就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些事件均远在 17、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之下。中国与欧洲的这次文化交流高潮，除去序幕和尾声，起自利玛窦来华，止于钱德明去世，大体上延续了 200 年。

17、18 世纪的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踏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期的中国，依然处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主宰之下，仅有些许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清之际中国的经济实力，领先于欧洲诸国，正因为如此，欧洲一些强国尽管竭力向远东扩张，却几乎没有可供向中国输出的产品，而中国价廉物美的丝绸、瓷器等却成为欧洲人竞相追逐的珍品。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国商品源源流向欧洲，在欧洲造成了经久不衰的“中国热”。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切向往和深入了解的强烈愿望。如果说，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是造成 17、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应该承认，在这个高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便没有 17、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一方面，他们将欧洲的各种信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帮助中国人观察天文、绘制地图、铸造大炮，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欧洲的学术著作，传授欧洲的音乐、绘画知识等；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欧洲人作详尽的报道，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他们还在熟练掌握汉语的基础上，刻苦钻研中国经典，努力探索中国文化的底蕴，除了将他们的研究成果陆续不断地寄回欧洲外，还将一些中国经典译成欧洲文字，在欧洲出版，极大地方便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进一步的研究。传教士为了研读中国的古典经籍和学习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以拉丁文编写了中国的文法书籍和字典，寄回欧洲国家出版，为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中国文化提供方便。例如，意大利会士

卫匡国 (Martimus Martini) 编写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 开中国文法西传的先河, 现仍保存于格里斯哥大学亨得尔 (Hunter) 博物馆。1618 年, 比利时会士柏应理 (Philippus Couplet) 回国时, 曾以此书指导德国医生闵采尔 (Christian Mentzel) 研读中国语文, 闵氏又据此编写一本《汉文入门》(《Clavis Sinica》) 在德国印行, 为德国人学习中文提供方便。1685 年, 闵采尔还在德国出版《拉丁汉字小字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Sinico Characteristici》) 和《中国字汇式例与文法之建立》(《Specimen Lexici et Grammatica Institution》), 至今仍藏柏林国家图书馆。1728 年, 法国会士马若瑟 (Jos Maria de premara) 在广州编著成《中文概说》(《Notitia Lignuae Sinica》) 一书, 对于汉字之构造和性质进行详细的论述, 举例达 13000 余条, 成为西欧国家研究中国文字的鼻祖。马氏以其书寄给法国学者傅尔孟 (E. Fourmont) 校阅, 傅氏又据此自编《中国文典》一书, 于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762 年, 罗马教廷传信部出版奥斯定会士 P. Horatius della perma 和 Cassia us Beligatti di Macerata 两人合著的《藏文字母》, 以拉丁字母注藏音。1773 年, Beligatti 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 编著《唐古文及西藏文初学》(《Alphabetum Tangutum Sive Tibetanum》) 一书, 为欧洲国家学者学习中国藏族文化开辟了道路。乾隆时, 法国会士钱德明 (Joan-Joseph-Maria Amiot) 编著《满洲语语法》, 孙璋 (Alexander de La Charme) 编著《满蒙对照字典》, 为欧洲国家的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满、蒙文化提供了工具。

著名的传教士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利玛窦 (Matthaeus Ricci) 等经澳门进入广州, 到肇庆、韶关、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后, 为传教需要, 十分注意研究儒教、道教和佛教, 崇拜儒家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神观。他们研究孔子的思想, 翻译儒家的经籍, 撰写解释儒家思想的专著, 向欧洲国家介绍儒家的哲学思想。如比利时会士柏应理 (Philippus Couplet) 于 1681 年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共分四大部: 第一, 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 第二, 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 第三, 孔子传; 第四, 《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本书既向西欧国家介绍了儒家的经籍, 又略举其重要注疏, 便于欧洲人民接受。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济 (Franciscus Noel) 著《中国哲学》(《Philosophus Sinica》) 和翻译《四书》、《孝经》、《幼学》, 向法国介绍了他研究儒家哲学的心得。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茨 (Cofuried Wilhelm Leibniz), 于 1687~1690 年间, 在罗马先后结识意大利闵明我 (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等一批从中国传教回去的传教士, 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中国儒家经籍资料, 从此发奋研究中国哲学。于 1697 年写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一书, 全面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和文化, 高度称赞中国文化之伟大, 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 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 现在从东方的中国, 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在书中又指出, 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 说: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 就是在军事方面, 中国也不如欧洲; 但在实践哲学方面, 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于是, 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甚至认为, 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 前来教导我们自然科学的目的与实践。”莱布尼兹汲取了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 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 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

传教士在澳门及中国内地传教过程中, 攻读中国古典经籍, 并把中国经籍翻译成西文出版发行,

使之在欧洲各国得以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书名为《F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这是中国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艾儒略（Juleus Aleni）在他著《利玛窦行实》一书中说：“利子此时尝得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因而悦之。译为中邦经书，其能识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利子之力也。”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印行。意大利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和葡萄牙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Sinica）两人合译《四书》，把《大学》译名为《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于1662年在南昌出版。后殷铎泽又译《中庸》，译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和1669年分别在广州及印度果阿出版。1711年，卫方济以拉丁文翻译《四书》、《孝经》和《幼学》，由巴拉加（prague）大学图书馆印行。康熙末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节译《书经》、《诗经》出版。1752年左右，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iexander de La Charne）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翻译《书经》在巴黎出版。

中国文学也随着传教士来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而向欧洲传播。1719年，在广州经商和居住多年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首先将中国小说《好逑传》翻译成英文，于1761年在英国出版发行，向英国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学东渐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传教士把西方当时的先进的东西带到中国来，让中国人了解了世界，同时他们也了解了中国。

首先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许多奇巧之物，如三棱镜、自鸣钟、世界地图和地圆说——给中国带来了世界地理学的新观点等等，他利用这些东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他的继承者们在此基础上发扬了他的精神，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新知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下面对他们的成就分别作一介绍。

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为宣传西方的宗教，而且还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他也学到了中国的文化。他除了为中国带来西方的如三棱镜、自鸣钟等一类的东西，还为中国带来了世界地图以及欧洲关于天文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历法改革提供了依据，带来了数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几何原本》，将笔算法传入中国，将透视画法、记忆法和音乐传入中国，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等。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是以知识传教模式打开中国大门，并在中国立足、发展的。应该指出，作为一个宗教的差会，作为执行教会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其目的，传播知识只是一种手段。对此，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概莫能外。其次，作为以反对宗教改革为特征、在欧洲以保守著称的耶稣会，其来华所传知识，自然不会是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由于欧洲与中国在文化传统、知识系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实在太大，由于此前中西天各一方，来往交流甚少，所以，耶稣会士所传知识，尽管在欧洲不算先进，仅属常识，或已陈旧，但在当时中国，却